

結束語

發展導向與制度創新

本書企圖說明，中國沒有像東歐蘇聯經濟轉軌國家一樣，選擇「休克療法」和「從頭開始」的私有化，不是因為思想保守、不開竅，而是因為「休克療法」和「從頭開始」的私有化看上去悲壯激烈，實際上既不符合邏輯也不能操作實用。言猶未盡的是，中國人就聰明，早就知道「休克療法」和「從頭開始」的私有化是銀樣蠟頭槍——中看不中用？不是。

發展導向

「回歸歐洲」，是薩克斯等再三強調的、東歐國家變革的指導思想（Sachs 1992b，第20頁；Sachs 1991；Sachs和Lipton 1991，第46頁）。甚至前蘇聯也接受這個口號（Soros 1990）。雖然西歐各國現實的經濟制度，根本不像「休克療法」大夫們描繪的那樣簡單純潔，這個口號確實代表了轉軌的明確方向。

不幸或值得慶幸的是，沒有一個「歐洲」可以讓中國回歸。1978年以來，中國各方面、特別是思想理論界，都受到了西方巨大的影響。但是，在改革的決策實踐過程中，卻始終沒有形成一個統一和清晰的目標模式。換句話說，沒有歐洲可回，回哪兒？或者去哪兒？「摸着石頭過河」成了前景模糊的象徵，因為不知道河的彼岸在何處。帕金斯觀察到：「有關改革優先順序的文獻正在增加。但是，中國改革並沒有明確的順序，大部分中國領導人沒有一個清晰的改革目標」（Perkins

1992a，第4頁）。拉迪奇怪：「中國共產黨在改革年代通過了數十種根本性改革措施，卻從沒有過一個全面的、帶有具體實施時間表的改革藍圖」（Lardy 1992，第3頁）。

因為沒有明確的歸宿，中國的改革實踐，很大程度上依靠純粹實用主義哲學的帶領。鄧小平有關「不管白貓黑貓，抓住老鼠就是好貓」的譬喻，就是決策過程中真正的指導方針。1978年那一場著名的辯論，結論是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。

經過幾十年計劃經濟，向市場經濟轉軌，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代價。這是薩克斯等對東歐蘇聯轉軌陷入困境的一般解釋。在改革前的三十多年裏，中國人民曾經狂熱地信奉一系列真理，並為這些偉大理想付出了巨大的代價。「文化大革命」使所有狂熱信仰破滅。中國人民已經付出了太多。剩下來屬於他們的真理，是簡單地要求生活水平的改善——當然不僅是經濟生活，也包括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。他們之所以要改革，恰恰是因為不願意再為那些看上去美麗、實際上痛苦的東西繼續付出。硬要他們再次付出巨大的代價，是沒道理的，不公平的。為普通老百姓的利益，我們應盡最大的努力，避免跌入薩克斯「休克療法」之後的所謂「流淚之谷」（Sachs 1991，1992a，1992b），另闢蹊徑。

政府的實用主義哲學，人民的期望，都使得中國改革不可能、也不應該採取休克的方式。正確的改革道路只有一條，即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。中國的改革，濫觴於最底層、最貧困的農民。在落後偏遠的鄉村，改革是免於飢饉的唯一途徑。蘇聯改革完全不同。「新思維」的大蠱，由西服革履的戈爾巴喬夫，揭槩於首都富麗堂皇的國會大廳。這個根本的不同，使中國的改革，一開始就是一個如何吃飯的實踐問題，不是一場通常人們表面理解的政治或意識形態的鬥爭。

薩克斯等人將自己的政治選擇和意識形態信仰，強行加入有關經濟轉軌決策的討論（見 Sachs 和 Lipton 1990，Lipton 和 Sachs 1990，Kornai 1990a）。科爾奈甚至直接了當地宣稱：「事實上，我可以稱（我的觀點）是我的偏見，因為我的見解明白地基於（特定的）價值判斷」（Kornai 1992b，第 5 頁）。與此相反，在中國，由於沒有一個清楚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目標，改革決策和辯論是非的方法，只好是先做實驗、再檢驗實踐效果。在中國，「理論不是選擇的指南，真正的推動力來自實踐」（Murrell 1992，第 90 頁）。於是，中國的改革變得短視。從長遠眼光看，它確實還是半拉子改革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（去哪兒？）。然而，關鍵的問題是，哪兒是頭？甚麼才叫「充分徹底」的改革？憑甚麼標準來判斷中國改革應走的方向、步伐、時機和方式？用「休克療法」和「從頭開始理論」當仲裁，實在令人難以接受。如果接受這種理論，特別是科爾奈《走向自由經濟之路》的版本，我們立刻無法解釋，為甚麼日本（見 Johnson 1982）、南韓（見 Amsden 1989）和台灣（見 Wade 1990）時至今日，仍然在走向自由經濟的「半途」徘徊？為甚麼它們不需要也來個「休克療法」和「從頭開始」的私有化？

單從概念出發，中國改革好像一只多色混雜的花貓，既不是蘇聯教科書上的社會主義，也不是美國教科書上的資本主義，又不是東歐國家曾經有過理論描述的所謂「第三條道路」——市場社會主義。中國正在摸着石頭，探索屬於它自己的新路，一個混合了上述三者，而且從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豐富經驗中汲取營養的新模式（Perkins 1986, 1991b；Nolan 1992a，1992b；Lo 1992b）。這種探索有賴於更加成熟的學術探討和理論創新。確實，在學術方面，探討中國改革的前景，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

實踐中，如何解決吃飯問題，如何改善人民生活水平，要比如何將中國變型的計劃經濟改造成教科書式的自由競爭市場，更朴實、更容易理論。帕金斯對中國改革的實質概括得如此簡單而真實，以致於許多經濟學家視而不見：

1984 至 1988 年，中國的勞動力增加了 6,140 萬人。在這個巨大數字中，4,800 萬人（78%）為農業以外的其他部門所僱用。1989 年和 1990 年，勞動力增加了 2,410 萬人。其中 1,850 萬人（77%）卻必須由農業部門吸納。我們用「吸納」這個詞，而不用「僱用」，因為實際上農業部門已有超過一億的勞動力在某種意義上是多餘的。到公元 2000 年，中國的勞動力將再增加一億五千萬人。政治上，中國已不可能繼續將其中的四分之三安置在早已勞動力過剩的鄉村。要避免這種困境，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至少要有 6~8% 的年均增長。但是，如果經濟體制不改革，這樣一個增長速度將導致通貨膨脹，促成新一輪的信貸緊縮。要避免這種走走停停的增長，中國需要形成市場導向的金融體系和市場化的工業（Perkins 1992a，第 26 頁）。

這是為甚麼，不論誰掌權，中國的改革都不能停頓的原因。這也是為甚麼，中國不能接受「休克療法」和「從頭開始」私有化的理由。

轉軌還是創新？

經濟發展是一個需要時間的動態過程。改革同樣是一個需要時間的動態過程。人們通常說的中國改革的「漸進模式」（gradual approach），簡單地說，就是將發展與改革這兩個漸進過程相結合。發展是硬道理。這是中國改革區別於蘇聯東歐「休克療法」和「從頭開始」私有化的本質所在。

兩個說法值得強調：

第一，中國改革的「漸進模式」不是「慢慢來模式」。譬如，中國七十年代末的農村改革就相當猛烈。「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制」將集體的大田切成小塊，分到每一家農戶，走得比今天多數蘇聯東歐國家還「遠」。所以，所謂中國的「漸進模式」不是說改革只能慢慢來，而是說改革必須符合經濟發展的需要。譬如，中國沒有採用「休克療法」來改革價格體系。中國首先展開的是工業結構調整，將過度發展的重工業生產能力轉向消費品生產。很快，長期短缺的消費品供應飽和。這時，中國在「買方市場」的條件下開始放鬆價格控制。

第二，說中國改革的「漸進模式」不是「慢慢來模式」，最主要的原因是，中國改革與「休克療法」和「從頭開始」私有化，壓根兒就不是朝着一個方向。在蘇聯東歐，轉軌是從計劃經濟轉到市場經濟；更直接了當和政治化的說法是，從東方社會主義轉到西方資本主義。在中國，改革是為了由窮變富，並非「主義」的問題。在東歐，斯滕恩赫抒情地描繪：「市場經濟離不開私有產權，就像身體不能沒有腦袋；就像美麗恬靜的佛羅倫薩大衛不能沒有米開朗琪羅的創造力」（Steinherr 1991，第4頁。重點號為原文所有）。在中國，鄧小平的說法是：「不管黑貓白貓，抓住老鼠就是好貓」。為了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，「摸着石頭過河」是中國改革的基本哲學。沒有明確的方向，有的是 GNP。科爾奈反復強調，他多麼堅定地相信資本主義私有制。與此不同，除了經濟發展，中國人並不堅定地相信甚麼。因此，中國改革並不十分介意應該做甚麼，而考慮更多的是能做甚麼。只要能加速發展，都可以拿來試試。譬如，在中國，人們並不太介意究竟是地方政府還是企業應該參與經濟發展，更多的考慮是企業和地方政府各有甚麼能力、能夠做甚麼事情。結果，地方政府自然而然地成為當地經濟發展

的領導，扮演了部分企業家的角色。

沒有一個明確的改革指南，「摸着石頭過河」，使中國政府有足夠的機會犯錯誤。同時，也為中國改革提供了創新的可能。在中國改革的政策決策經歷中，領導人確實曾經認真考慮和討論過科爾奈和薩克斯等的種種建議，包括「休克療法」。沒有採納這些所謂「激進」的方法，並不是由於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束縛，只是簡單地因為不能當收立效地增加 GNP。在增加 GNP 的壓力下，中國選擇了倍受非議的價格「雙軌制」和「所有權迷宮」。這裡的「寶」押在一種可能性上：十二億人口、五千年文化，誰家的現成經驗也救不了中國。獨一無二的中國，非走出一條自己獨一無二的特殊道路不可。

現代資本主義的歷史不是「從頭開始」以後就一成不變了，而是一個通過熊彼特的「創新性破壞」，破壞舊的、創造新的，不斷演進的歷史。在現代企業制度的進化過程中，英國發明的股份公司超越了傳統的「個人企業」，使組織大規模現代化生產成為可能。然後，日本經營者通過法人交叉持股，徹底擺脫了所有者的控制，使經營者主導企業得以構造團隊精神，強化「生死搏鬥」式的「過度競爭」。英國九十世紀和日本二十世紀的所作所為，不是所謂「次優」選擇（second best），而是超越當時「最優」的制度創新。如今，越來越多的人們同意，經濟改革或轉軌沒有現成的教科書可以遵循。但是，很少人意識到，這句大白話暗示我們的是，現存的「最優」理論不能解釋和解決經濟改革的問題。一旦我們有幸找到自己解釋和自己解決問題的道路，找到的一定是「次優」，還是可能超越現存「最優」的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？

在波蘭，由於外資和私人資本進入很少，企業清算的結果是員工所有佔主導地位（Teresa、Julian 和 Pawel 1992，第 40

頁)。匈牙利的私有化同樣鼓勵員工持股 (Bonin 1992, 第 721 頁)。俄羅斯的私有化導致 70% 以上的大企業 (員工超過 2,000 人) 變成經理和員工所有 (Buck、Filatov 和 Wright 1993, 第 13 頁)。蘇聯東歐的實踐進一步證明科爾奈的「從頭開始」是多麼脫離現實生活。不管多麼虔誠, 「真正有血有肉的私人」, 找不着就是找不着。過了這村就沒這店。那裡是蘇聯東歐私有化的下一站? 漢基斯在東歐的發現發人深省。「當國有企業轉化成股份公司時, 公司股份被其他公司和銀行購買。同時, 進行股份化的企業也購買其他公司和銀行的股份。轉軌經濟中的股份公司很快會變成法人交叉持股。從交叉持股中, 經理的地位得到交叉所有權的保護, 經理階層獲得幾乎不受控制的權力」(Hankiss 引自 Cui 1991, 第 9 頁)。換言之, 蘇聯東歐「從頭開始」私有化的歸宿, 是不期然而然地走向經營者主導的法人交叉持股。

在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結構調整的基礎上, 「所有權迷宮」和「地方政府公司主義」, 成了支持 12 億人口的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兩大支柱。在蘇聯東歐「休克」和「從頭開始」這段日子裏, 產權不清、政企不分的中國, 奇跡般地成為僅次於美國的、世界第二大外資流入國和世界第十一大進出口國。中國、香港和台灣的貿易之和已佔世界貿易總額的 10% 以上。如果中國——儒家文化的中心與發源地——能有成功的機會, 那麼, 「摸着石頭過河」的經驗或許能成為一次空前的「創新性破壞」。其實, 日本企業的法人交叉持股和「官商一體化」的經濟體制, 就是向西方資本主義現成模式的挑戰。南韓和台灣的經驗更進一步, 國有企業與政府參與發揮了更突出的重要作用。今天, 中國、越南、蒙古和老撾的經濟改革和發展速度, 都明顯不同於要「回歸歐洲」的蘇聯東歐 (Perkins 1992b)。雖

然存在有太多的不確定因素, 我們仍然有信心說, 只要不盲從、不迷信的探索能夠持續, 中國改革的「創新性破壞」, 一定能夠推翻薩克斯的「休克療法」和科爾奈的「從頭開始理論」, 在所有過去創新的基礎上, 創造出具有中國特色的、具有超越性的現代企業制度和經濟體制。